
再论抗战文学中的重庆城市形象塑造

王学振

靳明全先生最近在《文学评论》发表《深化国统区抗战文学之我见》一文，对国统区抗战文学（或曰大后方抗战文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其中提到的重庆形象的扭曲和还原问题，尤其使我深受启发。受篇幅限制，也因为不是文章的重心所在，靳先生对这一问题没有进行更为具体更为详尽的解说。我觉得意犹未尽，所以不揣浅陋，愿意循着靳先生的思路，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阐发。

诚如靳先生所指出的，目前的大后方抗战文学研究对重庆形象有着很大程度的扭曲。提起抗战时期的重庆，研究者关注的只是《雾重庆》、《重庆二十四小时》、《腐蚀》、《寒夜》等有限的几个文学文本，联想到的也是“雾”和“寒夜”等阴冷的意象。在宋之的的《雾重庆》中，一群流亡到重庆的爱国青年报国无门，加之衣食无着，只得违心地干起了开饭馆、批命论相、当交际花等营生，有的在贫病中死亡，有的则心安理得地做起了发国难财的走私生意；在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中，难产的妇人面临着死亡的危险却因为没有钱而做不成手术，绝望的落魄者梦想着离开重庆回到昔日的花花世界，贪婪好色的奸商算计着单纯的少女，愤世嫉俗的正直青年四处碰壁；在茅盾的《腐蚀》中，曾经参加过学生运动和救亡工作的女青年，抵制不住特务头子的威逼利诱，堕入了特务组织的罗网，在奔走效劳的同时，还要遭受高级特务的侮辱和玩弄；在巴金的《寒夜》中，一对曾经立志“教育救国”的夫妇，在社会给与的经济和精神的沉重压力下失去了锐气，男的在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之际满怀怨愤地死去，女的则成为上司装点门面的“花瓶”。

由这些文本看来，抗战时期的重庆完完全全是十足的吞噬弱者的地狱、腐蚀青年的魔窟，在这里似乎只有官吏的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特务的横行霸道、草菅人命，奸商的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小人物的贫困潦倒、求告无门。

但是我们不禁感到疑惑：这就是抗战时期真实、全面的重庆形象吗？如果作为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的重庆仅仅只是一个地狱和魔窟，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乃至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何以会取得伟大的胜利？

要全面评价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要准确把握大后方抗战文学中的重庆形象，首先必须认清这样两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其一，自 1937 年 11 月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移驻重庆开始，重庆不仅成为了国民党在大后方实施统治的中心，也成为了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远东指挥中心。正如华盛顿之于美国、莫斯科之于苏联、伦敦之于英国一样，抗战时期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是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的世界反法西斯名城重庆。

其二，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结果。”“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由于抗战时期特别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也由于当局在政策、措施方面的各种严重缺陷，国民政府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的统治是很不如人意的（特别是曾经屡次挑起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摩擦），但在坚持抗战方面却还是有着一一些积极的举措的，特别是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以重庆为代表的大后方人民更是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起到了不容抹杀的重要

作用。

基于以上历史事实，我认为抗战时期的重庆应该是一个复杂、矛盾的多面体，既有其阴冷的一面，也有其热烈的一面，既有其黑暗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既有其污浊的一面，也有其清明的一面，总之一句话，既有其负面，也有其正面，正如曾卓《重庆》一诗所写，重庆“一面是荒淫与无耻的山城”，一面是“庄严的工作”。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大后方抗战文学既然可以表现重庆形象的负面，又怎么会不表现其正面？上述文本主要表现了重庆形象的负面，应该说也是有着其产生的生活基础的，从文本本身来讲不可谓不真实，但从准确把握重庆形象的角度来说，却又是绝对不够全面的。

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中心，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以往的大后方抗战文学研究往往对重庆形象的负面大加渲染，而对那些正面表现重庆形象的文本则给与有意无意的忽略、滤除。这样以偏概全、以部分代替整体，就造成了对重庆形象的人为扭曲。

其实这很不明智：抗战时期的重庆固然是国民党统治的象征，又何尝不是抗战中国的象征？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对重庆形象加以贬损，难道不也是对抗战中国形象的贬损？

在重庆形象的负面被过度强调的情况下，本文关注的主要是其正面。在我看来，大后方抗战文学中重庆形象的主导特征是悲壮，其正面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大的方面。

一、坚持抗战的精神堡垒

重庆可以称得上是坚持抗战的精神堡垒。重庆人民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精神在重庆大轰炸中得到了集中而鲜明的体现。

日本军国主义以武力迅速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被粉碎后，改变了侵略方针，希望依靠威慑性轰炸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促使国民政府投降。在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日军对重庆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无区别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对重庆共出动飞机9513架次，实施轰炸218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面对自天而降的浩劫，重庆并没有屈服。

重庆人民在“五·三”大轰炸留下的最大的一个弹坑上建起了象征抗战意志的“精神堡垒”，“精神堡垒”被炸毁后，人们又在街心竖起一根高大的旗杆，以示精神不倒。在跑警报的间隙里，重庆人民照常地生活，更加努力地工作，正如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所说：“我们规定要做的事，必须照着规定的去做。”重庆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使其获得了国际性的美好声誉。1942年6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

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无数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缚之象征。”1942年7月7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致电重庆人民：“五年中有四个寒暑，中国实际上是单独抵抗侵略，单凭着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对抗侵略者的军队飞机的进攻。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可是它却经历了足有五十个敦刻尔克而仍然坚定不移！”

1944年5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向重庆赠送卷轴，其译文为：“余谨代表敝国人民，向重庆市敬赠斯轴，以表吾人钦佩该市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足证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毁其精神。此种为自由之忠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

关于重庆大轰炸的不少文学文本，成功塑造了作为坚持抗战的精神堡垒的重庆形象。

郭沫若的《轰炸诗》表现了重庆人民面对灾难时的镇定和力量：“人们忙碌着在收拾废墟， / 大家都没有怨言， / 大家又超过了一条死线。 / ——回来了吗？ / 一位在废墟忙碌着的中年男子， / 远远招呼着赶回家的女人。 / ——窝窝都遭了，怎么办？ / ——窝窝都遭了吗？ / 女人平静地回问着。 / 这超越了一切的深沉的镇定哟！ / 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 生命是不可战胜的！”

孙瑜导演的电影《火的洗礼》展示了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的忘我工作，连日方的女间谍都受到了感化。正如影片中所说，重庆既是“雾之城”，也是“火之城”，“在抗战中成长”，“在抗战中毁灭”，“也必然在抗战中更生”！

蓬子的诗作《夜景——陪都轰炸季小景之一》描写了重庆人民在轰炸间隙的生活乐趣，《奇迹——陪都轰炸季小景之二》则展示了重庆人民的创造活力：“燕子筑巢也没有这般容易， / 得衔泥衔草挣扎在风里雨里， / 一条街瓦砾，纵横着烟火气味， / 这才第五天都建起新的房子。 / / 只有梦里才有这说不清的怪事， / 移一座山填一角海随你的意， / 今天我们睁着眼睛创造梦的奇迹， / 人力与神力合而为一。 / 笑过分简陋会遮不住雨， / 星星会爬进瓦缝偷看你的凄苦， / 四年来我们原在死里求活， / 多尝一点苦味算什么稀奇！ / / ……”

老舍在“五·四”大轰炸中欣喜地发现了五千年文明的力量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地奔向公园。偶然有声高叫，是服务队的‘快步走’，偶然有阵铃声，是救火车的疾驰。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地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血与火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记住，这是‘五四’！中国人民不接受这火与血的威胁！”

我们要用心血争取并必定获得大中华的新生！我们活着，我们斗争，我们胜利，这是我们‘五四’的新口号。”（散文《“五·四”之夜》）当时流行于重庆街头巷尾的《大轰炸民谣》更是传达了重庆人民的乐观精神和必胜信念：“让你龟儿子轰！ / 让你龟儿子炸！ / 老子们有很好的防空洞， / 不怕！ / 老子们有广大的农村， / 不怕！ / 让你龟儿子轰！ / 让你龟儿子炸！ / 老子们总要大反攻， / 怕啥！”

最令人叫绝的是任钧描写防空洞里的爱情的诗作《他俩》：“他俩是在防空洞里认识的—— / 当初夏的艳阳 / 开始照临大地的时候， / 当山城的雾幕 / 给热风吹开的时候， / 当大批大批的敌机 / 常常来访的时候。 / 敌弹使无数的家人父子 / 都不能不暂时分离， / （多少人已经被疏散到四乡！） / 但也使得许多人 / 由陌生变成相识 / 由认识变成知己。 / / 他俩 / 不久也便由相识 / 变成相爱。 / ……恐怕敌人也完全没有想到过吧？—— / 他们的屠杀和破坏的炸弹 / 竟变成了 / 使得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媒妁

二、支持抗战的后方基地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中国可谓国弱民贫，却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为最终战胜日本和世界法西斯反动势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中国也由此跻身于举世公认的“四强”之一。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沦陷，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中心城市相继落入敌手的不利形势下，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的战略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也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特别是包括重庆在内的四川（当时重庆隶属于四川，所以下文的论述无法将重庆与四川截然分开），可以称得上是支持抗战最为得力的后方基地，正如《新华日报》1945年10月8日的社论《感谢四川人民》所言：“在八年抗战之中，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

抗战时期就有人说四川对于抗战的贡献是出命、出力、出钱，这个概括应该说是很到位的，下文就分别从这三个方面论述作为支持抗战的后方基地的重庆形象。先说出命。

为抗战“出命”的，首推抗日军人。四川是抗战时期最为重要的兵源补充基地，当时就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八年抗战中，共有 300 余万巴蜀子弟出川抗战，其中伤亡达 60 余万人。这个数目是惊人的。

据 1943 年 9 月国民政府内政部统计，当时四川总人口 46438490 人，共 4329682 户，其中男子 24199029 人，18 至 45 岁的壮年男丁 5451551 人。如此计算下来，平均 1.4 户要出 1 个兵，平均 15.4 人中有 1 个兵，平均 8 个男子中就必须有 1 个人当兵，壮年男丁平均 1.8 人就必须有 1 人当兵。

面临着如此沉重的兵役负担，难免有人想方设法躲避兵役，更有一些贪官污吏公然违反国民政府规定的“三平”原则（平均、平等、平允），趁机中饱私囊。对此，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艾芜的《意外》、吴雪等人的《抓壮丁》等文学作品已经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

但是更多的民众还是勇敢地承担了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也有一些忠于职守的官吏积极推动了征兵工作的正常开展。中国军队绝非如《抓壮丁》中王保长所说，全是一些抓来的“跛子、驼子、老头子、独生子”，果真如此，岂能抵御强敌的入侵？踊跃参军的感人事迹在大后方重庆时有发生。比如 1943 年底开展全国知识青年从军活动，重庆原定征集 5000 人，结果不长时间内在申请登记的知识青年就达到 8331 人，超过定额 3300 多人。

大后方抗战文学中，不少作品表现了以重庆为代表的大后方人民保家卫国的热情。李华飞的诗作《听，那峰峦》展示了“绿竹一样的年轻行列 / 从山城，挺拔的去到祖国的原野”的雄壮场面；老舍在重庆创作的歌词《丈夫去当兵》描绘了妻子送别丈夫勉励其奋勇杀敌的动人场景；叔文的小说《招弟和她的马》中，小女孩招弟魂牵梦萦的是哥哥在前线抢匹鬼子的好马回来，自己到队伍里去当马夫；彭慧的小说《巧凤家妈》中，巧凤家妈四十多岁了，还想去当女兵，为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女儿报仇；苏怡的电影剧本《还我晴空》中，在重庆开饭馆的杨明生养育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三个儿子当了兵，大儿子因为要留下来照顾年迈的父母，就近参加了重庆防卫空袭的防护团，女儿也参加了救护队。

这些作品没有回避兵役工作中的矛盾，但其中的矛盾最后都得到了较为理想的解决。蒋牧良的小说《父与女》中，何老太爷声称不送儿子去当壮丁就是汉奸，却为自己的两个年轻力壮的儿子弄来了现役证明书，使他们成了不穿军服的“副官”，在从战地服务团回来的女儿的支持下，两个儿子都毅然离开了家庭奔赴前线。史东山导演的电影《好丈夫》中，王镖入营受训，乡绅潘老爷之子却得以无故缓役，王镖之妻二嫂大为不平，欲请人写信让王镖离营回乡，后来县长对二嫂进行了慰问，又处理了潘老爷和狼狈为奸的保长，二嫂大为感动，又请人写信勉励王镖多杀鬼子。

有些作品还塑造了在征兵工作中恪尽职守的廉明官吏形象。《好丈夫》中的县长就是一例。又如在徐盈的小说《征兵委员》中，尽管区长和绅士们关心的是“一个名字值几十块钱”，征兵委员吴克家却坚持“按户抽丁，不许顶替”，并想方设法来推动征兵工作，在他的感召下，征兵工作终于得以正常进行。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重庆还有一类为抗战“出命”的人，这就是曾经臭名昭著的中统、军统特工。在内战期间，中统、军统特工曾经犯下滔天罪行，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在日寇侵略期间，中统、军统特工还是一定程度地参与了收集情报、刺杀敌酋等抗战工作的。比如日本将要偷袭珍珠港的电文就被军统特工池步洲破译，美军击落日酋山本五十六的座机，也得益于中美合作所提供的准确情报。

据统计，在抗战中军统特工共有 18000 多人殉国。在茅盾的《腐蚀》等作品侧重展示特务统治的阴森恐怖的同时，大后方也出现了一些歌颂特工的作品，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当属陈铨的剧本《野玫瑰》、《无情女》和荆有麟的小说《间谍夫人》。《野玫瑰》

写受南方（可以视为重庆）派遣的女特工夏艳华为了刺杀伪北平政委会主席王立民，忍痛离开自己的恋人，以身事敌，后来发现可以利用王立民刺探情报，又改变计划，忍辱负重地与王立民一起生活，以“主席太太”的身份从事着秘密工作。《无情女》中，女特工樊秀云利用舞女身份和日伪之间的矛盾，玩弄敌人于股掌之中，将游击队需要的枪弹偷运出城。《间谍夫人》中，作特工的丈夫牺牲了，其妻继承夫志，经过重重考验，终于加入特工组织。

《野玫瑰》1941年6—8月连载于重庆的《文史杂志》，是根据陈铨一年多以前创作的小说《花瓶》改编而成的。有趣的是，在《花瓶》中并没有出现夏艳华这样一个女主角。陈铨为什么要这样改写呢？我想除了增加演出效果方面的考虑外，恐怕还受到了当时“郑女士”英勇事迹的触发：

汪精卫叛变投敌之后，其亲信丁默任汪伪南京政府警政部长兼特工总部主任，对重庆的秘密工作构成了很大威胁，美丽风流的郑萍如女士临危受命，以美色接近丁默，伺机刺杀，不料功亏一篑，事败被捕，于1941年2月被汪伪政府枪决。郑萍如牺牲后，当时发行量很大的《良友》杂志，在130期封面上以“郑女士”为名，刊登了她的玉照，陈铨也许得闻此事。

次说出力。

抗战时期的四川不仅出兵最多，出力也最大。为开辟巴蜀交通，支援前方军需，四川动用民工250万以上，修建了川陕、川滇、川黔、川湘四条公路以及南北前线和滇缅前线在境内的交通道路，整治了川江航道；为加强防空力量和配合盟军作战，四川先后征调民工90万，兴建空军基地33处，其中包括新建和扩建新津等4个轰炸机场、重庆等5个驱逐机场。

据《新华日报》载，仅特种工程一项，四川服工役的民工总数就在300万以上。如果加上往前方运送军粮等项，动用民工的总数还会大大增加。

在条件极端简陋的情况下，四川人民踊跃出工，用血汗铺就了这些工程。大后方抗战文学也对此有着形象的表现。彭慧的小说《巧凤家妈》、萧乾的报告文学《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庄涌的诗作《给筑路的农夫》都是以筑路为题材的。《巧凤家妈》讲述了女民工巧凤家妈为筑路而献身的故事：女婿当兵抗战去了，女儿又被东洋飞机炸死，为了给女儿报仇，巧凤家妈先是想去当女兵，没有成功，后来听说修铁路修公路“好运军队上火线去打东洋人”，就义无反顾地和几个壮汉子一同去了。路越修越远，家越回越少。为了“一直要把路修到打东洋的火线上”，她下大雨也不休息，不幸被垮塌的山体连泥带雨地活埋了。《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以动人心魄的笔墨，描绘了千百万民工“铺土、铺石，也铺血肉”的事迹，对修路民工唱出了热情的赞歌，表现了人民群众无比的创造力。

刘北汜的小说《山谷》则以修建军用机场为题材，年轻力壮的儿子在采石场牺牲之后，年迈的父亲又带着年幼的孙子来到工地。写川江航运的作品也不少。吴祖光的《船曲》表现了三峡船夫“摩顶凌云”般的气概，阿垅的《纤夫》礼赞了在嘉陵江上运送粮食和种子的纤夫：“嘉陵江 / 风，顽固地逆吹着 / 江水，狂荡地逆流着 / 而那大木船 / 衰弱而又懒惰 / 沉湎而又笨重， / 而那纤夫们 / 正面着逆吹的风 / 正面着逆流的江水 / 在三百尺远的一条纤绳之前 / 又大大地——跨出了一寸的脚步！ / /”

再说出钱。

四川虽然古称天府，在抗战时期其实已经地竭民贫，

但仍然勉力支撑，贡献了巨大的财力物力，维持着抗战大局。据统计，八年抗战国民政府财政总支出为法币14640余亿元，四川承担了约4400亿元，占30%以上；1941—1945年，四川田赋共征收谷物8408万石，占全国征收谷物总量的1/3以上；四川还为前方将士供给油、盐、糖、肉等副食，提供马料、桐油、药材等物资，交纳军棉，缝制军衣军鞋；四川农民生产了数

以万担的生丝、猪鬃、桐油、茶叶，出口到美、苏、英等国，换取中国急需的外汇。除此之外，四川人民还多次发动献金、献机、募集寒衣等运动，有力地支持了抗战。仅在冯玉祥将军个人发起的献金运动中，四川各地的捐款就达到了 5 亿元。1940 年冬至次年春，重庆合川县各界捐献飞机 3 架，被认为是“献机最多，首倡成功”的县级单位。

大后方抗战文学中也有不少作品忠实地记录了重庆人民在财力物力方面的贡献。前述苏怡的电影剧本《还我晴空》就表现了重庆市民的无私捐献。杨明生本是一个难民，好不容易才在重庆开起一个饭馆，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目睹重庆被轰炸的惨状，他还是将做生意的现金全部捐献了。全家人因此生计无着，杨明生却一点也不后悔。沙白的诗歌《嘉陵江上》则展示了重庆对前方的支援：“……春天 / 从仓中起出陈年的宿粮 / 一袋一袋的运下船舱 / 静静地泊在江岸白杨花下翘尾的小艇 / 又开始随着新潮 / 驶向那迢迢的远方 / / 几百里外 / 那下流的荒寂的地方呵 / 千万双眼睛里 / 饥饿的火燃烧着 / 千万颗焦急的心 / 在刻计着那扯满风帆的粮艇的到程 / ——嘉陵江上插遍着欲求的希望呵 / ……从祖国腹脏里奔流而来的嘉陵江呵 / 嘉陵江上正孕育着无上的光辉的希望……”

祛除意识形态的偏差，还历史本来面目，还文学本真形态，是我们必须记取的准则，研究重庆形象如此，研究其它文学史实亦然。